

0410

安泽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泽县委员会

安泽文史资料

第四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泽县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EA29/10
本辑 主 编：逯丁艺

副主编：曹新军

校 对：郭树忠 姚红梅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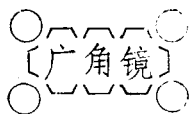
安泽初期建党的策略.....	逯丁艺 (1)
孟广福谈良马建党.....	(8)
革命军开监放人.....	(10)
王豫培老人谈妇女放脚.....	(11)
孟殿臣老人谈男人剪发辮.....	(13)
抗战初期重庆《新华日报》 有关安泽战事的报道.....	(14)
朱总司令在安泽再谈.....	逯丁艺 (18)

（远方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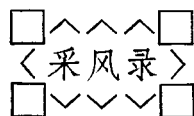
刘敏塘同志来信（节录）.....	(21)
吕思贤同志来信（节录）.....	(23)
靳文华同志来信（节录）.....	(25)

☆———☆ | 人物春秋 | ☆———☆

杨晋升.....	(26)
尚传文.....	(29)



赵大斌回忆录（节录）……………（32）



相 家……………逯丁艺（41）
绞 脸……………（42）
采 艾……………（43）
机智的媳妇……………逯丁艺（44）



府城战前的商业经营状况……………段谦礼（45）
府城人过节……………滕安德（50）
府城的庙会……………滕安德（55）
进住府城随感吟……………牛元方（58）

土地制度的变革……………逯丁艺（59）

编后语……………（77）

安泽初期建党的策略

逯丁艺

1938年9月，中共太岳区特委，派出以张潮、宋川为领导的八路军工作团，来到当时县政府驻地和川镇。先期到达的有宋川、董省三、陈登善、小郭，随后有张潮、徐琳、洛英、孙瑞，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建立发展共产党组织。抗日工作比较容易，因为国共两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可以大张旗鼓地进行。建党却困难得多，这是因为：（一）太原陷落后中央军有三个师涌入安泽，并派出地方工作团四出活动，扩张势力；（二）阎锡山一向反共，县、区、村长都经他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绝不许共产党介入辖区；（三）共产党处于秘密时期，不能公开亮出旗帜。加上反动派单方面的宣传，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误解。真是困难重重，迈步唯艰。但是，八路军工作团的领导，尤其是负责实际工作的宋川同志，巧妙而灵活地应用了斗争策略，终于站稳脚跟，达到了“钻眼子、安钉子、深深扎根群众中，稳步建立党的组织”的目的。

一、高举统一战线旗帜，树立八路军坚决抗日的形象。

宋川同志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党务工作者，他深知“合法地位”的重要性。共产党要在“友党”、“友军”和阎锡山

政权面前取得合法地位，站稳脚跟，必须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友党”，“友军”搞好关系，合作共事，当然，其前提是抗日救国。他主动与阎锡山政府、中央军地方工作团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广泛接触，密切联系，广交朋友，共同协商发动群众抗日事宜。凡是县政府、中央军、群众团体召开的会，他都积极参加，发表演说。有时候也适度地说几句国民党、蒋介石与阎锡山的好话，而更多的是借机大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宣传八路军为民族抗敌战斗的宗旨。以此在群众中树立共产党和八路军坚决抗日的形象，为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发展党的组织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利用合法身份，通过群众团体培养骨干。

阎锡山怕共产党插手政权，中央军怕八路军扩充武装。工作团开始“回避”了这些敏感方面，而是通过群众团体，深入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培养骨干，壮大力量。当时比较进步的群众团体是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虽然也是阎锡山领导的，但不少进步分子、共产党人成为该团体的中坚力量。安泽牺盟会的特派员张一樵就是共产党员。当时工作团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主要力量用于协助牺盟会开展工作，尤其着重抓了农民救国会与青年救国会的组建。因为农民与青年与共产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农民要求土地，青年追求真理，共产党会给他们以满足。农救会与青救会的骨干成员都紧密地团结在八路军工作团周围，提供情况，监视坏人，联系群众，推荐人才，为建立共产党组织创造了先决条件。

三、绕开险滩暗礁、先于农村建立党的组织。

和川为当时全县抗日运动之中心，各阶层包括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无不热血沸腾，激情昂扬，而且都争相亲近八路军工作团，送米面、干劳务、传消息、当门卫，很多人都表现得十分积极，十分革命。宋川与董省三同志反复研究，再三斟酌，没有确定一个入党对象。因为和川商号林立，人员复杂，地主阶级专权几十年，国民党区分部的工作无孔不入，和川镇内所有的人，包括当长工的、租种地的与要饭的，都多多少少与财主、富商有些瓜葛，不是直接也是间接，本人没有亲友也难免。共产党开始建党的每一个“棋子”，必须下得稳妥、牢靠。每一个入党对象必须十分可靠，万一失密，祸患无穷，因之没考虑在和川街上找对象。反复权衡，把注意力转向西洪驿，因西洪驿村多是穷苦佃户，其中不少山东人讲义气、敢斗争，他们在战前曾多次结伙上街找范如冈、四义和（字号）说理斗争，反抗地主阶级欺压穷人。首先将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尚宪纲、贺戊生、尚宪矩、李民德确定为入党人选，又通过他们了解到本村的李海光、尚宪经、郑四生等人，尚与贺还介绍了荆村的朱玉海、朱玉发，岭南的吴兴国、苗顺田及常宪耀的情况。1938年11月，在岭南以举办农救会骨干训练班的名义，培训入党积极分子，洪驿、荆村与岭南有13人参加，全部填表参加共产党。我县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在西洪驿村建立。尚宪纲任支部书记，贺戊生、吴兴国分管组织与宣传。

董省三也效法和川的办法，没有在府城街上考虑入党

人选。虽然37年入党的侯其昌、孙勤祥、温国华都住在街上，并推荐了几个人，董还是慎重行事，把建党的基地选在高壁、桃曲和义唐三村。先以高壁村的吴希春、张鸿德、元永德、陈兆耀为对象，通过他们了解到桃曲的周德芳、赵志德、马继才，义唐村的司马乐、段立功、刘启敬等人的情况，这些人也都参加了岭南的党训班，加入了党组织。同年12月建立高壁党支部。

此期间37年入党的张效亭在孔村教书，侯其昌早年在西上寨居住，与张廷栋、张廷臣兄弟相善。张、侯二人积极向董省三建议，在孔村发展党员。董省三考虑到孔村阶级关系复杂，又当南北通道路口，中央军常骚扰，南庄有长毛道，怕有闪失。而当时桃寨和西上寨属孔村编村，尤其是西上寨地处偏僻，中央军国民党的势力都探不到，八、九户居民全系贫穷佃户。董省三亲临察访，与张廷栋、张廷臣谈过几次，认为张家兄弟与刘体旺、付聚才、牛秀山都诚实可信，觉悟也高，因之向宋川汇报，同意把建党基点放在西上寨，桃寨与孔村的党员到西上寨过生活。年底，西上寨支部设立，张廷栋任书记。

分派去北片建党的陈登善原打算去唐城镇。唐城当时是四区公所驻地，国民党区分部与十七军地方工作团控制十分严，不许八路军涉足，连临近的义宁、固县村，陈登善都呆不住。陈不得不再远离“是非区”，去上县找到范登华、张玉龙，在北崖底结识了郭树塘，介绍其三人入党，建立了党小组。

据山西省档案馆资料：1938年，安泽县共有党员

61名。已知的八路工作团6名、政府机关及公安局62名、区长中有2名，计14名；农村党员为47名。全部是岭南党训班培训的骨干，回村之后也都做农救会的工作。这样便于更广泛地联系农民群众，亦符合“严守秘密”的建党原则。

四、开展减租斗争，建立巩固的党组基地。

1939年5、6月，日寇连连发动大举进攻，将抗日政府所属机关团体逼到东北隅罗云一带。这时的八路军工作团（县委）领导人是韩柏，成员有周震、武体太、李时伟等。工作团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政府机关到罗云一隅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地面缩小，形势严峻，不少人悲观失望，丧失胜利信心；有利的一面是罗云与沁源毗连，更接近太岳区党委，便于得到上级党委的支持。果然，中共太岳区特委派出以袁致和为领导的工作团来安泽协助县委开展工作。袁致和同志是太岳区工教会主席，熟悉阶级斗争，善长发动群众。他建议县委深入开展减租减息，反对恶霸势力，从斗争中发现骨干，壮大党的队伍。县委采纳了这一建议，有重点地开展了对“四大天王”、“八只虎”、“恶霸张文郁”的斗争。斗争是有节制的，对罪大恶极顽固不化的“四大天王”之一的梁振海（议亭村长），坚决予以镇压，对其它的地主恶霸分子则主要通过减租说理斗争，让基本群众提高觉悟，得到实惠，坚定跟共产党走的决心。通过“双减”与反霸斗争，吸收了一批阶级觉悟高又具有斗争性的积极分子入党。从县委档案馆的资料得知：19

39年上田有党员9人，北崖底有党员5人，安上、孔村、东洪驿、罗云、议亭各有党员3人，双头、东寨（孔旺）各有党员2人。这样多村连片建立起党的组织，对巩固以罗云为依托的安泽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当年的“十二月事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五、适应抗日斗争，把党建工作伸向抗敌前哨。

1939年4月份，日寇在城关、古县、祖师顶安了据点，日伪还不断出兵府城和北平镇设临时据点，逼迫群众“维持”。日伪是主要敌人，为适应对敌斗争，就要在近敌村庄发展党员。这一工作十分困难，因为敌人一安据点，临近十里之内都不见人，一二十里的游击区，我党派人去工作，日伪也派汉奸活动，中央军和二战区也相机钻营，稍一不慎就可能“引狼入室”，祸患无穷。县委派出的区分委武体太、柴占厚、李安都是干将，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实情，分辨清敌、友、我，积极而又慎审地在二区的连庄、一区的大峪、四区的疙堆、宝丰与贾寨等村（现均属古县），物色到倪焕文、李秀德、张福英、王国龙、牛兆兴、牛兆明、刘林伍、常义亭、原继英、董兆清等一批可靠对象，发展他们入了党。以他们为骨干，团结群众，坚决地进行反“维持”斗争，配合八路军和游击队打击日伪武装，工作卓有成效。

六、坚持独立自主，放眼未来，发展党的组织

1939年5月之后，中央军主力退至路南，166师驻安泽南部，阎锡山的旧军附翼其后，不许有八路军共产党的影响。国民党是友党，中央军与晋绥军是友军。在

一般人看来要维护统一战线，恪守“君子协定”，不宜涉足友军驻扎区，以免引起“磨擦”。据说当时上级党委曾有过不在友党友军驻扎区发展党员的建议。但县委领导认为：统一战线本身即含有联合与斗争的两个方面，对于友党友军的进步势力自然是讲联合讲统一，对于其中的顽固分子不可不察其动向，防予不测，准备斗争。何况友军驻扎某地只是暂时现象，从长远看共产党与八路军的势力与影响必然向外发展。冀氏、石槽本属安泽区域内，岂能搁置不顾？因此，派出先于岳南有联系的张效亭、温国华等人，与有些工作基础的兰村、郎寨与石槽村进行工作，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当年在兰村、郎寨各发展3人，石槽发展5人。兰村处南北交通咽喉，郎寨是国民党安泽县党部活动中心，石槽为166师师部驻地。关于友党友军的情况及顽固势力的动向，不仅安泽县委需要明瞭，太岳区党委也望能获悉。石槽与兰村的党员张立业、郭兴福、梁兴华和尚庆美等做了不少工作。后来由于郎寨、石槽个别人变节，温国华、张立业遭国民党逮捕，受尽酷刑，党的组织也蒙受了一定损失。但“十二月事变”中，我党在岳南的工作人员能安全北撤，这三个党组织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即使温、张二人获释，也是借重于国民党内思想进步人士的出力担保，才凑效的，而争取这些进步人士为我效力，自然也是党组织在起作用。至于随后中央军退出岳南，我党开辟岳南工作，石槽与兰村的党员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低估。历史证明：1939年中共安泽县委在友军驻扎区建立党组织是有胆有略的远见卓识。

孟广福谈良马建党情况

1938年8月，八路军白晋游击队驻良马，有一百来号人，队部住在万裕公字号，指导员名郭文高，是沁源县人。那时我才19岁，家里很穷，在良马街给人打零工干杂活，穿的很烂，面黄肌瘦。郭指导员却能看起我，天天找我聊天，什么都问，如问良马有几家财主，怎么欺压穷人？问村里有多少人当长工、打短工，长工月工资多少，短工日工资几角？还问我家几口人？父亲是干什么的？等等。一天，他叫我到村外河边，悄悄问我愿不愿翻身过好光景，再不当长工受人剥削？我说当然愿意了，可是自己命不好，是受苦的命。他说：“共产党就是要领导穷苦人革穷“命”，拔穷根！”他问我愿不愿参加共产党？我说愿意，可是怕自己不够格。他说：“当共产党不容易，要能团结穷苦人，要敢于向反动派斗争，要能遵守党的纪律。不过这都可以学习，只要听党的话，什么事也就不难了。”我当即表示一定好好学习。他特别告戒我说：“当前形势很复杂，有日本汉奸，有国民党特务，还有地主分子、二战区的奸细。入党之后最最要紧的是保守党的秘密，即使对自己的父母妻子，也不能说自己是共产党，不能把党里的人和事往外讲，一个字也不能讲！”他问我，你能做到么？我说能！他说那好，晚上你到我屋里来。

八月二十五日（农历）晚，人们快入睡的时候，我到了万裕公后院，进了东厢一间小屋，屋里就郭指导员一人，点一盏小煤油灯。他拿出一张表，按表格问我，一项一项帮我填写，末了让我在表下方我的名字上按指纹。他说怎么过生活有人会找我联系。他又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炯炯目光盯住我叮嘱说：“记住党的纪律！”我知道他说的是“守秘密”，我慎重地肯了首。

五、六天以后，郭琪文来找我，他当时住小关道，他要我晚上去他家。我去到他家见有牛树林、牛兆录、曹文生。郭琪文说：“咱们五人一个小组，上级任我当组长，今后每七至十天单独接触一次。”接着他就告诉我们党员要干些什么。后来我单独找过他几次，有时在地头，有时在山坡，有时在河边。我向他汇报过中央军要军粮，别动队招人，圣人道与青帮的活动等方面的情况。

良马支部属于八泉区委领导，区委书记名芦春阳。有个委员大高个，姓李，人称李麻子。1940年2月的一天，李麻子去窦庄联络人，正巧中央军四十五师谍报班在窦庄，见他是生人，来路不明，说话吞吐，就把他关起来。我们大家都十分心焦，积极设法营救他脱险。他是脱逃了，但糟糕的是谍报班从他身上搜去一份党员名单。这一下可坏了大事了！敌人顺着名单一个一个的抓人。虽然区委也知道大难临头了，要党员各自躲避。我跑到小寨南山松树庄一个亲戚家住了十几天。后来听说郭琪文叫中央军打死了，那天正逢他兄弟结婚，敌人抓他时他已逃出村，敌人开枪把他打死了。当时还有别的党员遭杀害，也有

的被抓去，个别人还变节叛了党，良马支部被冲垮了。

1941年5月，中央军被日本人打垮退出岳南，八路军开辟工作，恢复党的组织。1942年我去沁源太岳区党校学习，同时参加了整党整风。回来后担任良马村党支部书记兼武委会主任，村长是岳理生，农会主席是郭明才。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但我一直记着1940年2月那次血的教训，也记得郭文高指导员的谆谆教导：党员最最要紧的是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

（1977年访问老孟笔记）

革命军开监放人

1912年1月，辛亥革命后三个月，山西革命军五路招讨大都督李岐山，派洪洞人陈其麟去沁源一带收容由娘子关退下来的散兵。李都督给了陈五十两银子的费用。陈其麟来到安泽唐城镇，住了半个多月，收容了百十名带枪的旧日军士，整编后带他们向平阳府开进。路过安泽县城，见监狱里还押着很多囚犯，是清朝衙门所为。知县老爷逃之夭夭，监狱长也不见面，只有两个守狱员看门。陈其麟指使革命军砸开监狱，放脱囚犯，还有几个跟革命军从军走了。

录自《山西文史资料》第九期

王豫培老人谈妇女放脚

我今年82岁，民国元年我刚两岁。记得辛亥革命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妇女放脚。本来嘛，好好的一个人，生硬要把脚缠得小小的，行动不方便，身体极虚弱，如同残废人。这是中国妇女千百年来受的最大压迫，早就该废除。可是，由于封建社会歧视妇女，不仅从精神上压制妇女，从肉体上也摧残妇女。咱们安泽地处偏僻，人不开化，妇女受的压迫就更深。拿我们家来说吧，父亲王之哲是县议会会长、宗圣会会长，我家又是书香门第，父亲又很爱见我。但是，由于传统的旧势力很大，封建恶习根深蒂固，直至民国三年我五岁那年，母亲还强迫我缠脚。不行呀，当时妇女老老少少都缠脚，家家户户都一样，妇女脚大了找婆家都没人要，母亲也不得不守旧习。其实这时辛亥革命已经三年了，政府早就下令要妇女放脚，可老百姓就是不听。到了民国六年，阎锡山政府下了一道硬命令：要各县成立天足会，由知事（县长）兼任天足会会长，强行妇女放脚，工作行不通的知事要撤职，缠脚妇女的父母亲要受罚。天足会设干事4人、会计1人、书记2人。我父亲还在天足会兼任过书记。回家后说妇女放足的事，我就哭着要父亲准我放脚。父亲十分支持，说服了母亲，我就放了脚。我的侄女王爱玲，还有张桂丹、秦玉娟、秦淑媛、女校教员李小秀，还有一个姓彭的媳妇也参加了天足会的工

作，主要宣传妇女放脚的好处。每当庙会、逢集市，她们就上街向群众，尤其是妇女宣讲天足的好处：（一）妇女能解脱终身的痛苦；（二）便于妇女劳动、工作，与男子无异；（三）有利子孙后代健康成长；（四）有利于振兴中华民族。宣讲的时候还发宣传画。我当时虽然已放了脚，还愿听她们宣讲，也爱见那些宣传画。有一套宣传画在我房里挂了二三年。那时推动妇女放脚运动，还采取了一些硬措施，记得有一次将城里的年青妇女集中在南门外麦场上，一个一个地检查。听说有几个妇女并未放脚，而是穿了大鞋，鞋内塞了棉花套子哄天足会的人。查出来后天足会罚了其父母的钱。少者二、三元，多者七、八元。后来我和王爱玲她们还下到各区宣传妇女放脚的好处，检查妇女放脚情况，有六、七次之多。不过，这件事也太难太难了，因为一些父母太守旧，太顽固，死抱着旧传统不放，千方百计地瞒哄检查人。有的把女儿藏在大箱子里，有的把人送到山沟小庄亲戚家去。咱安泽地面大，山沟小庄特别多，查也查不遍，何况一些糊涂的父母弄假作弊，工作就更难了。不是有个别的妇女六十岁刚出点头，今天还是小脚吗？可见民国十八九年、二十几年，还有些母亲给女儿缠脚。可知积习难除哟！

不管怎么说，妇女放脚总算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辛亥革命的一大胜利，我是享受这一胜利的一代人中的一员。我民国五年入女子学校读书，十二年考入临汾山西省第六师范，十四年师范毕业，在城关及石壁村执教三年。如果没有妇女放脚我绝不可能到外地去读书，也无缘出任